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集刊

# 农村·经济·社会



## 第二卷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

知识出版社

# 农村·经济·社会

(第二卷)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

知 识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编辑工作有：郭亚夫、王燕臣、高菊生、丁晓聪、谢 扬、白若冰  
王小强、邓英淘

**农村·经济·社会**

(第 二 卷)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5 字数651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书号：4214·26 定价：3.60元

# 目 录

为农村发展事业而奋斗 (代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

## 一、工作研究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二期研究计划大纲(摘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6)

## 二、调查研究

开发山区的探索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8)

集体林区林业发展若干问题探讨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一).....杜鹰(26)

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二).....吴奇 王群英(42)

山区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的道路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三).....袁崇法 史永铭(52)

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探讨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四).....李灼荣(65)

农村经济形势的新发展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五).....周其仁(73)

农村民办大型联合体和承包大户探索

——广西梧州地区与广东高要县调查.....张木生(90)

社队企业与区域农村发展.....孙方明 白若冰(99)

社队企业发展与经济改革.....白若冰 孙方明(118)

贵州省农业生产结构中的几个问题.....张木生(13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改革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36)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重新组合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一).....高山(144)

✓ 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经济政策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二).....邓英淘(154)

农业生产控制方式改革的探索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三).....陈锡文(163)

## 农村的人口与劳动力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四).....白南生(172)

## 农村自有资金情况的分析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五).....高小蒙 白南生(192)

## 农民进取性考察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六).....白南风(214)

## 农民意识的现代化进程

——江西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七).....黄晓京 林克雷(229)

## 农村商品流通中的“四难”问题

——江西吉安、赣州地区流通问题调查.....孙方明 刘丹华 李小康(246)

## 三、专题研究

以农村为突破口实行分区立体开发的改革战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255)

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陈一谔 王小强 邓英淘 何维凌(264)

论中国特色的合作制.....张木生(268)

研究农业生态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王耕今(276)

农村市场价格初探.....宋国青(281)

围湖造田的后果和对策.....王耕今(300)

——湖北省洪湖、鄂城等地调查

试论商业经营责任制中利润的二重性.....赵尔烈(303)

浅谈固定资产投资率.....刘慧勇(307)

关于发掘科技人员巨大潜力的几点建议.....何维凌 王彦 王铁南(312)

试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近期目标.....王彦 何维凌 王铁南(317)

## 四、理论 方法

论战略的本质特征.....杨 勳 邓英淘 罗小鹏(326)

对讨论我国现实问题时使用“资本主义”范畴的一些认识.....周其仁(334)

对绝对地租的再认识.....王晓鲁(338)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王小强(347)

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对策.....高王凌(357)

和西欧对比,看中国封建社会不稳定和长期延续的原因.....毛 挥(377)

经济危机理论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孙方明(387)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费尔巴哈》中的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李 零(402)

(代 序)

# 为农村发展事业而奋斗

##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总结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快两年了。近两年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帮助和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对于进一步明确全组研究方向、统一思想认识很有必要。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一个具有时代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严肃的选择——如何将自己有限的一生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去。

从1979年到1980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几十名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机关干部、研究生和大学生，决心选择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们最适宜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鉴于以下一些认识：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国度里开展的。农民贫困，中国就谈不到富强；农村的事情办不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第二，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三起三落”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农业的相对发展，不仅工业不可能得到持久的长足进展，并且还会产生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良后果。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步伐，必须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第三，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说明，经济改革从农村入手，利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率先改革农村经济，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提供物质准备。同时，农村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管理体制，也将对工业、交通、商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改革产生强大的推动和渗透。所以，农村改革对于全面经济改革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四，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包含着环境、技术、经济、社会诸领域的丰富内容。但农村问题的研究，却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人员很少，研究内容十分有限。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总之，就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没有一个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只有少说空话、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摸索、去实验、去总结，才能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开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综合研究的尝试。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启示下，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产生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首先是党的直接领导和许多领导同志热情支持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组同志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献身奋斗的结果。无论是在北京学习还是在基层调查，我们时刻感到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和真理的力量。这种力量给了我们决心：不论碰到多大困难，也要把我们所献身的事业坚持到底！

## (二)

为了搞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建组初期我们经过反复酝酿，提出的原则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为农村发展服务，为民族振兴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注意吸收现代科学方法，提倡多学科、高层次的系统综合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等等。这些原则对我们两年来的研究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初步统计，经大家努力，近两年我们完成的研究成果约计400多万字（其中，论文、调查报告120多万字，资料编辑200多万字，翻译90多万字）。

这期间，关于总体研究构想的长时间讨论，为以后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首先，我们组织了急需的基础资料整编工作。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部系统的农业经济研究文献索引，广大研究工作者颇感不便。1981年3月，我们完成了《中国农业经济文献目录》（修订稿），共收入1840~1980年间有关文献目录近两万条，100余万字。计划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编写新中国农业经济史，我们在查阅30年来我国有关农村政策和农业经济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编辑了《中国农业大事纪要（1949~1981年）》初稿（共约3万字）。为了适应双包到户迅速发展的要求，1981年3月我们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计56万字，发行近6万册。受到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欢迎。此外，我们还着手进行了《列宁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编译工作，组织翻译了包括《经济控制论》、《经济发展概论》在内的若干外文资料。

调查研究是组内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双包到户一出现，我们就参加了安徽、甘肃的调查，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为责任制的顺利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近两年来，研究组组织和参加了安徽、甘肃、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河北、山西、江苏、江西、湖南、吉林、辽宁、广西、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地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在当地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整理出有关农村生产责任制、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农村经济结构、农村市场流通、农产品价格、农村干部和体制改革以及农村社会学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共50多篇。为有关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性意见。其中有20多篇被不同报刊选用。

1981年夏在安徽滁县地区围绕“双包”问题进行的调查，是实行多学科综合性调查研究的一次尝试。调查组由20多名不同学科和研究方向的人员组成，以典型调查、专题调查、综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较全面地调查了该地区“双包”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和发展趋势，回京后写出了《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综合报告）、《双包到户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专题报告——下同）、《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双包到户后的社会贫富问题》、《双包到户基础上的协作与联合问题》、《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等十余篇报告。1982年3~5月对广西梧州地区的调查，是综合调查的又一次尝试。这次调查完成的综合报告——《开发山区的探索》和其它6个专题报告，对广西梧州的山区综合开发、集体林业发展、农村资金运动、农村劳动力素质、农业生产责任制，

以及“承包大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两次调查及其成果，证明了综合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今后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与此同时，研究组部分同志还参加了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若干会议，就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看法，撰写了《关于农村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关于农村实行政社分家的几点意见》等报告，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配合总体研究而展开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共完成阶段性专题论文几十篇，部分已经发表。其中《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论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论战略研究》等文章受到读者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另一些专题论文，如：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工作的总体计划构想》、《农村税收和其它劳动扣除与择优分配》、《影子价格在农业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我国经济调整 and 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化战略》、《论适度农业劳动力》、《农业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宏观分析》、《论社队企业》、《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关于农业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二十世纪上半时中国粮食生产的效率和水平》、《论文明研究》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指导全组研究工作的总体构想，在占有材料、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完善。最初的粗略设想日益具体化。反映总体构想部分框架结构的论文《以农村为突破口，实行分区立体开发的改革战略》的讨论稿，已于近期完成。总体研究构想的进展，将使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更明确，全组配合更紧密。为了使协同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研究组除了不断向老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请教咨询外，还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进行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在建组后主要以业余形式开展活动的阶段，方法组和理论历史组分别组织了两个读书会，举办了几十次学术交流和讲座。这些学术活动，对于改善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增强科研协调的意识、培养集体创造的合作精神，以及培养团结战斗的感情，起了很好的作用。

### (三)

总结研究组成长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条。

第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

研究组从酝酿到成立，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极左路线导致的思想、政治上的沉闷气氛开始被打破，社会上各种思潮活跃，但同时，“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还没有彻底澄清。人们都在认真地思考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而又作出不同的回答。这种状况反映了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性。研究组的同志们之所以能够摒弃极左的空洞说教，又没有陷入所谓“信仰危机”，正是因为大家置身于历史的潮流中，同全国人民一起去思考问题，回顾历史，探讨现状，展望未来，并力争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这种从民族的历史和我们自身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认识，使我们日益坚信：中国绝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因而，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根本不能完成民族振兴的千秋大业。基于上述信念，我们始终自觉地与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使全组的研究工作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国家农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指导下和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的指导下顺利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挫折，但正如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所指出的，只要站稳了社

会主义立场，坚持三中全会的路线，工作中出现错误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我们自己深感，没有正确目的和创新勇气的科研活动是毫无希望的；同样，如果不能在探索过程中对自己的方向作出正确判断，并正视工作中失误的科研活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研工作为社会需要服务。

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旦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不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毫无社会价值。一方面，研究组是应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建立的；另一方面，农村发展和改革的丰富实践，又不断深化着我们的认识，为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新的实践和实践的启示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对我们选择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作用。时代的需要是具体的，这促使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探索，不容许我们搞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时代的需要又是宏大的，根本不容许我们沉醉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要搞好多学科结合的综合性研究，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前进。毫无疑问，只有通过实践的反复锤炼，我们的认识才能逐步升华，我们的研究才会充满活力，由历史责任感唤发的热情，也才经久不息。

第三，始终坚持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没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是难以胜任的。建组初期，研究组就十分注意摒除门户之见，反对名利之争，着重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学风。对人员的选拔，始终坚持“不谋私利、有献身精神；有较好的政治品德和学术风格；具有一定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能力”这三条最基本的标准。这就保证了科研人员的质量和科研组织本身的内聚力。研究组成立以来，由于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研究工作，人员分散、无固定办公地点，加之资料信息供给和经费使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科研人员只能在相当差的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但是，全组人员不计个人得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克尽职守，始终没有中断工作。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保障下，研究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同时，研究组的领导成员和科研骨干本身较好的政治、学术素质，吃苦在前、遵守纪律的模范带头作用，也是推进科研工作的重要保证。

#### (四)

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作到立足现实，依托应用，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全组今后的研究工作应相对集中力量，不能过于分散。因而必须进一步明确全组的主攻方向，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不同类型区域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上，在认清国情上下大力气，以农村实行多种形式责任制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发展趋势为重点，探讨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此，全组的研究活动应着重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着重探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对策，包括农业生产责任制及其发展趋势，农村经济新趋势分析，农村工商业、农村生态与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二、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村经济分析。着重探讨农村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控制机制。包括资源配置的现状、变动趋势和资源配置理论与模型，经济运行和控制机制，经济数量模型（如：粮食、价格）等方面的研究。

三、不同类型地区农村发展的演化。着重探讨农村发展的类型、演化过程和战略。包括区域农业经济史，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类型，农村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

四、不同类型地区农村社会与组织。着重探讨农村社会的文明传统和组织方式问题。包括中国农村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中外农村社会对比，社区调查，农村社会组织与干部，等方面的研究。

发挥集体优势，加强协同作战，是我们科研工作的基本原则。研究组支持和鼓励有价值的个人长期研究计划，同时也强调任何个人的研究都要配合全组的研究主题。

为了搞好综合研究，科研的组织与协调必须力争达到“集体设计，分组承担，系统综合，协调攻关”这种既灵活又富有战斗力的状态。继续实行单元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分散研究与集中研究相结合，专业研究与业余研究相结合，组内人员与组外人员相结合的办法。

科研组织工作必须保证科研活动的顺利进行，并尽可能创造一种熔炉式的学术环境；科研领导工作要努力使全组活动实现较高的效率，并为培养和提高每个成员的科学研究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创造条件。同时，要关心科研人员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创造较好的研究条件，使他们能够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科研工作上来。全组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意保守机密，严明组织纪律，培养优良作风。今后对新成员的吸收，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成熟一个吸收一个。现在成员必须在政治水平、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学术素质、工作能力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根结底，我们过去所做的一点工作，离事业的需要、离党的要求、离我们自己预想的总体研究目标，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缩小这个差距的唯一途径，是提高效率、更加努力地工作。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庞大、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更多学科的大批专门人才用新的方法组合起来，在协同研究中付出更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初步努力，只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点学术侦察。中国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有待于我国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有待于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

(1982年8月)

#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 第二期研究计划大纲(摘要)

1982.2~1983.2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为了使研究组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认清国情的坚实基础上,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内,研究组将以农村实行不同类型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发展趋势为重点,组织比较系统、周密的农村调查,围绕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研究工作力求采取多学科、高层次的系统研究方法,实行技术、经济、社会政策可行性综合研究。争取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某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能够提出解决我国农村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参考性意见,以及对我国农村近期、中期可能的发展趋势的看法,为系统研究我国农村发展战略打下基础。

研究工作大体分为三部分: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料整编(包括资料翻译)。

(一)综合研究 课题:不同类型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完成方式:今明两年,选择不同类型的二至三个地区作为重点,集中力量和时间,采取多学科结合攻关形式,在调查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组成综合课题组,完成二至三篇区域性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在对若干不同类型地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

(二)专题研究 1.不同类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比较分析 考察对比不同类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条件、特点、利弊、前景和宏观控制调节问题,分析不同责任制情况下基层管理职能的变化和适应性。

2.责任制实行后的农村市场和流通问题 着重探讨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市场的变化趋势,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方式和渠道,农副产品的价格和收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3.责任制实行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变化 考察若干典型农村社区,比较分析其在解放前后若干阶段的历史沿革,生产、生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尤其是责任制实行后,收入分配、城乡关系、道德、心理、传统和领导管理方式的变化。

4.典型区域的经济分析 着重探讨如何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发挥区域经济优势;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农村投资的合理分配、促进地区经济开发,同时保持中央的干预和控制能力。

5.全国粮食中期控制模型 要求建立粮食需求、供给、运输、储备和费用的数学模型,并据此分析不同参数情况下的总体经济效益,提出相应的控制对策。该课题由我组与其他六个单位(华中农学院、北京农机学院、河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委员会等)协作完成。

6.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 整理并翻译经典作家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比较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重点是研究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主要任务。

7. 区域性农业经济史 本期完成“皖东农村三十年”、“新乡七里营今昔”等区域性农业经济史的编写任务。以后准备陆续选择不同类型地区进行此项工作。

8. 若干地区农村发展的演变趋势 着重探讨农村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类型、结构以及领导管理体制的演变趋势。

此外，将视需要组织有关专题研究组。如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问题等。

(三) 资料整编 1. 1982年上半年完成《农业经济文献目录》(1840~1980)定稿工作；下半年着手编辑《农业经济文献选辑》。

2. 1982年上半年完成《中国农业大事记要》(1949~1981)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的整编工作，12月底前完成统一定稿工作。

3. 1982年底完成《列宁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文选翻译和编辑工作，送有关部门审定。

综合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本期研究计划所列课题只是这个长期研究任务中的一部分，而这些课题还将随着实际需要作某些调整和补充。

研究组的研究活动本着立足现实、总结历史、注重发展的精神，为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研究组愿与一切热中国农村发展的同志合作，并准备随时吸收有献身精神、不谋私利、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采用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工作。

# 开发山区的探索

## ——广西梧州地区农村调查综合报告

###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我国南方广大低山丘陵地区的近期开发,是一个能够对中国农村发展全局发生显著影响的区域发展问题。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农村发展的宏观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西梧州地区,地处北回归线两侧,纵跨南、中两个亚热带,属桂东南丘陵区,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作物品种多样、水电资源丰富,且东距广州仅四百公里,又有西江水运之利,开放度较大。全地区1980年国民收入人均202.5元(折合126.5美元),人均集体分配收入80.88元,粮食单季亩产519斤,人均有粮722斤,口粮563斤、贡献粮137斤,分别高于广西平均水平。1981年以来,实行生产责任制势头很猛,调整生产结构步子较快。总起来讲,该地区发展潜力大,现有水平中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动。考察这个地区的农村,对于研究以开发山区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农村发展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今年① 3~5月,我们在梧州地区的七个县35个公社作了实地调查,并用寄发调查表的办法对全地区51个公社作了书面调查,此外,在地委调研室和地区农办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还同地区24个同农村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多次座谈,形成了8个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这次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综合报告如下。

### 上山的问题是出路问题

梧州地区农村发展离不开做山的文章。我们同那里的同志一起算了四笔帐:

第一笔帐,梧州的土地资源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农业收入构成却近于“田八山二水零”。全地区耕地299.5万亩,占总面积8.4%;山地面积2,599万亩,占71.4%;人均耕地0.96亩,人均山地则达8亩,但以1980年农业总收入计,耕地收入共28.924万元,占71.39%,(粮食占60.42%),整个山地收入,包括林业、林副业、山区土特产在内共7,564.59万元,仅占18.67%。水面渔产收入更少,仅占0.49%。平均每亩山地收入2.93元,只及每亩耕地收入的3%。在自然地理上相当于耕地面积八倍的山地,在经济上所占比重却如此之小,生产率如此之低,反映了单一化农业结构明显的不合理。

第二笔帐,人增地减粮紧。全地区1981年人口345.52万,耕地297.55万亩,产粮216,763万斤,人均耕地0.86亩,产粮627.35斤,口粮504斤。从历史变动趋势看,全地区1952年至1980年,共增加人口140.6万,年均增长4.85万人;共减少耕地19.03万亩,年均减少0.656万亩;共增产粮食105,927.1万斤,年均增长3,652.66万斤。29年平均计,每增加7.39人口,6.61亩口、1.99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就减少一亩耕地。今后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为维持每年新增

① 系指1982年,下同。——编者注

加人口504斤口粮水平，每年也必须增产粮食2,419.1万斤。但在过去的29年中，有14年受灾减产。近6年来粮食三增三减，平均每年减产222.7万斤。根据我们对地区30年统计资料所作的回归分析，预测全地区1990年人均耕地0.73亩，人均有粮685.58斤；2000年人均耕地0.63亩；人均有粮712.8斤。但当前外部支援粮食几无可能，全广西每年尚有3亿斤商品粮缺额。由于人口基数高，年龄构成低，境内可开垦地少，复种指数较高。这个人增地减粮紧的趋势不可能立即停止下来。

第三笔帐，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严重。全地区平均每个劳动力担负耕地2.23亩，分别是全广西和全国的70.8%和53.3%。据调查测算，全地区整半劳力除了“双抢”农忙的二十多天外，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剩余。相对于水稻生产的剩余劳力，达80万人之多。而全地区山地分布很广，有山的生产队占82%。因此剩余劳力向山上找出路是最为现实的。

第四笔帐，发展潜力主要在山上。梧州地区的山有着特别高的自然生产力。完全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如全地区人均有林3.6亩，约比全国人均1.95亩多一倍，森林生长率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现有每亩森林蓄积量仅2.65m<sup>3</sup>，只有全国水平的28.5%。全地区只需达到1980年全国亩蓄积量水平，林业产值即可增加好几倍。再如油桐，1937年产桐油78万斤，1955年产200万斤，现在只有30万斤。毛竹，五十年代年收购170万根，现在只7~8万根。沙田柚，五十年代收购700万个，现在收200万个左右。这些品种，只要恢复历史最高水平，就可增加几倍到十几倍的收入。按现有中上经营水平计算，玉桂、水果、油茶、茶叶四项加权平均每亩收入400元，如将全地区现在荒山817万亩中的300万亩种上经济林，那么，全地区经济林面积可达417万亩，一年收入即可达16.7亿元，相当于现有山地总收入的22倍。只要每亩山地产值达154元，全地区山地总产值可达40亿元，那样，全地区总产值可达80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可达到800~1,000美元。离开山区经济的开发，置人均8亩山地于不顾，梧州地区就不可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

这四笔帐算出了一个结论：仅仅着眼于耕地和粮食的平面开拓生产活动方式，已经到了自身发展的尽头。要调整单一化农业结构，摆脱人增地减粮紧螺旋，减缓农村剩余劳力的压力，争得小康目标的实现，都必须把山的文章做足。对梧州地区农村来说，潜力和希望在上山，出路在上山。

## 吃山容易开发难

怎样上山？从这些年的历史来看，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上山吃山，即单纯凭借人口的数量与体力同自然界作最简单的变换，基本上靠大自然的恩赐，甚至不惜作掠夺性开采。

下述两种经济行为构成了上山吃山的主要内容：

(一) 开山旱作解决温饱。梧州地区的山地非常适宜木茹生长，人们只需毁林开荒，播种即有收获，生产过程极其简单。木茹的淀粉含量很大，既可补食粮之不足，又可用于喂猪或交售。三十年来，全地区平均每年开山旱作25万亩，最高达35万亩，主要用于种木茹。1952年全地区木茹播种面积21.4万亩，总产1,538万斤；1981年播种达55.6万亩，总产18,978万斤，分别增长1.6倍和11.3倍。

(二) 过量砍伐采集，急功近利捞钱。全地区森林年自然增长量为163.6万m<sup>3</sup>，但每年

消费森林资源273.3万 $m^3$ ，采伐量大于生长量约三分之二。由于过量砍伐，使木材收购质量逐年下降。如五十年代收购杉木平均直径24.3公分，七十年代为14.8公分，至1980年，12公分以下的小规格材已占总数12.4%。又如全地区毛竹，1958年收购曾达189.44万根，1980年仅收购10.84万根。松脂采割过量的问题也很突出，藤县1981年采脂2.6万吨，其中对未达采割标准的幼树开刀的竟达69.8%。

这两类经济行为几乎无需技术、资金、智能的投入，很容易普遍进行。走这条上山道路并不难。但是，在今天过窄的生存空间里，众多人口上山吃山却造成了自然界不堪负担的严重后果。

第一、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当前，危及长远。目前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89.16万亩，还有百万亩以上光山秃岭，造成每年有大量泥沙冲入境内河道。据梧州水文站统计，西江输沙量，五十年代年均6,460万吨，六十年代年均7,180万吨，七十年代年均7,860万吨。苍梧县境内上、下小河，每立方米河水含泥沙量8.69公斤，河床年均积高13~20公分，其中下小河1928年十吨帆船可上行50公里，1953年6吨木船可上行40公里。1958年中断通航，六十年代已成为地上河。现在两河每年雨季随时可以成灾，平均每年水毁、侵袭农田共11.36万亩，占这个商品粮基地县全部农田的29.25%。每年损失稻谷不下2,000万斤。同时水土流失，地表径流量加大，涵养水分减少，旱灾与涝灾俱增。岑溪县1980年10月大旱，全县除文昌江、黄华河分别有2.5和5个流量之外，其余329处大小河流全部断流，1,400处山塘水库只剩8处有水，其余全部干涸，全县枯死3万亩晚稻，比上年减产1,663.6万斤。

生态恶化直接导致水利投资效益递减，据地区水利局统计，从1958年算起，开始9年每年新增一亩灌溉水田需投资92.38元，中间10年为190.29元，近5年已达2,471.67元。全地区特别是南三县，一部分水渠河堤冲垮了修，修好又冲垮，一些中型水库，长期达不到设计水平；更有投资投工之后无水可蓄之库，无水可走之渠，白白劳民伤财。这种状况必然危及长远发展，对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农村面貌的各种努力设下严重障碍。

第二、客观上刺激人口增长。全地区1954年至1981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其中最高的年自然增长率达35.51%，而超过20%增长率的年份在27年中占13年。这同靠人力上山吃山是有关联的。依靠人力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刺激着更多的人口数量增加，形成更为众多的吃山力量。

第三、降低人口质量。过于简单的劳动方式，容易使人疲倦也容易使人满足。习惯于坐享大自然的天然恩赐，就无法培养很强的进取精神；凭体力即可以完成的行为，必不能激励人们提高智能追求技术。生产结构与劳动方式同农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素质之间的联系虽然是隐蔽的，但确会对农村的长远发展，发生无形而有力的影响。

因此，上山吃山的道路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它不仅不能改变生产结构单一化的趋势，而且终究造成全面的“自然—人口—技术—经济”危机，使我们陷入更难摆脱的战略被动之中而不能自拔。吃山固然现成而容易，但出路却因此变成绝路。

另一条道路是开发山区之路。所谓开发，就是要根本改变自给半自给经济中山区副业生产的从属地位，把副业当一项产业来办。开发又必须是综合的，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全面利用耕地、水面、草场、山丘等多种自然资源；其二是对这些自然资源不仅作一次利用，而且集约投入资金和技术，作多次利用。

综合开发山区至少有三个基本要求：（一）要适应经济周期长的特点，善于从短期收益

的生产项目中积累起能作长期收益项目投资的力量；（二）开发措施必须配套，要建设山区的基本结构，包括林种树苗培育基地，公路桥梁、送水装置、通讯、供电设施、加工运输销售条件、职业教育训练中心等等；（三）经营者必须具有超乎传统小农局限的眼光、气魄和能力。

在较低的起点上开始综合开发山区的探索，不能不遇到许多困难。从梧州地区来看，开发有七难。

一曰推力弱。群峦叠嶂是山区同外界交往的天然阻碍，长久自给半自给的生产方式又造成封闭内向的格局。环境凝成生产者经营者不善交往的特性，得不到充分的生产刺激和消费刺激。耳边没有一个声音不断地督促他们不断变革前进，就格外容易受传统观念的支配。囿于环境的满足是一种历史的惰力，同开发山区所必须具备的积极主动精神格格不入。

二曰资金缺。全地区1979~1981年年平均农用总资金约1.13亿元（财政支农资金约1,900万元，各部门扶持金60万元，农行农贷可用资金4,500万元，社队自筹生产费用3,540万元。集体提留1,3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应用于299万亩耕地经营。据近年国家投资构成的统计，平均每年每亩耕地投资4.38元，而每亩山地投资仅0.17元。后者只及前者的二十五分之一。

三曰技术力量薄弱。据我们在昭平、钟山、贺县、岑溪四县调查，在公社以下工作的各种技术干部共890人，平均每2,000农业人口、每370农户才有一名技术干部，数量实在太少。有限技术力量的结构又极不合理。全地区林业（包括森工）技术人员共339人，平均7.65万亩林业用地有一名。钟山县农学、植保、土肥专业的技术人员占整个农村队伍的87.01%；甘蔗、微生物、防化和其它专业只占12.99%。地区科委确定以人工养殖塘角鱼、食用菌、荒坡植牧草、沼气等七项适宜技术为推广重点，但苦于缺少推广力量。全地区33个山区公社，没有一个林业技术推广站（几乎社社有农业技术推广站）。至于集中攻关，继续研究试验适合本地区山区开发的技术力量，更是奇缺。贺县大宁公社油桐近十年大片结果而榨不出油。本地区无人能找出原因。1974年某农学院来人取样回去化验，至今时过8年杳无音讯。从木茹干片中提炼L-赖氨酸，对饲料加工食品加工有重大意义，外区已经成功，本地有几十万担木茹片积压，却无力量研制生产。长期以粮唯一的单一化结构导致了单一化的技术结构。

四曰劳动力素质差。劳动力素质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文化素质和从事经济活动素质。后者包括劳动者在广义农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技术水平和进取精神。全地区八县94个生产队5,465个劳力的素质调查结果表明：（1）文盲占17.1%，小学占54.9%；初高中占28%；（2）在广义农业活动中精通技术的占11.4%，粗通的占69.8%；基本不通的占18.8%。这即是说，文盲半文盲，不通技术或半通技术的占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此状况，现代科学技术在此一呼就难有百应，劳力密集向技术密集、智能密集的转折就难以完成。

五曰粮食紧张。开发山区非有粮食保证不成。全地区粮食紧张的态势已在上文作过简述，这对开发山区是极大的牵制。问题在于木本粮食替代同“以山养田”需要一个过程。而没有起码的粮食储备，这个过程就无法展开。全地区33个山区公社都有各自山林土特产的优势，但1980年7个公社口粮在400斤以下的，有16个公社要返销粮食510万斤。3个山区县，如昭平县，历史上“谷米向仰给予邻封”，但今天粮食必须自给已成不可逆转的要求。该县走马公社，是闻名港澳的“勤江茶油”产地，1954年交售茶油67万斤，近年降为2万斤。由于历史上以油换粮的外部条件失不复得，全公社只得用峡谷间冷水田维持人均400斤口粮和人

均70斤征购粮，疲于奔命，无力他顾。岑溪县人均水田只有0.53亩，生存空间在八县中最为狭窄，开发山区力量拮据。县委打算减压8,000~10,000亩粮田种蔗，（当地甘蔗亩产可达5吨）办一至二个小糖厂，积累进一步开发山区的资金。方案不能说错，可是涉及近2,000万斤粮食，地区和自治区都无力解决，至今拖而未决。

六曰交通不便。全地区尚未进入铁路时代，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里程11.3公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昭平、贺县三个山区公社统计，38个大队中有20个未通公路。农民交售林副产品主要靠人拉肩扛。运输用工占成本的30~40%，最高竟达85%。境内河道，或修水电、或泥沙淤积，通航里程大大减少。西江水运利用率也太低。运输条件差造成木材生产任务更多地压到公路沿线，而远山木材运不出，农民为生计只得毁林开荒。造成近山光，远山荒。这是开发山区的一个薄弱环节。

七曰加工能力小。农村体制基本未动前，全地区社队企业总值的9.96%来自冶金业，38%来自煤炭、电力、机械、建材；0.2%为化肥农药；5.7%为生活服务；剩下大部分来自建筑、运输、装卸等；进行山林产品初级加工的企业产值，比例不到10%。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产出方面日趋单一，使初级加工业也日趋单一，从而出现各级争抢原料的现象。盛产松脂的昭平、藤县、岑溪、苍梧等县，因见加工松香获利大，尽管地区已有年需6万吨松脂原料的梧州松香厂，但这些县为扭转财政匮乏，县、社，都纷纷办起松香厂，争抢松脂加工，大有雁过拔毛之势，都在打它的主意。

上述开发诸难，从根本上说根源于我国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历史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左倾错误及“一大二公”体制无助于克服这些困难，贻误了开发山区的战机。岑溪县六十年代大办山庄的战略目标未能如愿实现，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教训。

位于地区最南端的岑溪县，全县总面积415万亩，其中山地占304万亩，占78%。山多地少，五十年代末期，人均耕地就仅有0.59亩。由于收益低，资金缺，粮食生产条件在当时已日益恶化。

“林业是最大的积累！”由于耕地的紧张而处于困境的县委领导，在将眼光移到了山上时，看到了希望和出路。

县委当时提出，充分利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向山区进军，大办山庄。实现以田养山，以山养田。

具体奋斗目标为：一、力争现有水旱地高产；二、把近三百万亩山地中的绝大部分，分期分批种上用材林和经济林；三、把山地中坡度30°以下的山脚小丘，开辟成耕地，扩大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面积；四、逐步把全县四分之一人口即10万人搬上山去。

大办山庄的群众运动很快热腾起来。1962年全县三级山庄达5,013个，几乎队队有山庄。自1961年至1965年，全县向山庄投工284万个。其间，全县造林34万亩，（其中经济林占1/3）；多种经营纯收入在农业纯收入中所占比重，由36.6%上升到39.49%；农村加工业收入276万元的80%同山区多种经营相联系；全县粮食总产增长27.5%，人均口粮增长114斤；同时涌现了一批“山庄迷”。大办山庄取得了初步成果。

但是，山庄特别是社队两级所有的联营山庄，所需人财物力最初来自无偿调拨，评工记分办法又解决不了山上山下，特别是来自分配水平不同生产队的庄员之间劳动计量的复杂问题，做不到同工同酬，人民公社体制固有的权力过于集中，又不断作出一些错误的决策；越来越“左”的大批大斗、穷过渡和割尾巴更是挫伤了“山庄迷”的锐气。这样，进入七十年